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SSN 1005-9245, CN 65-1039/G4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网络首发论文

题目: 词元霸权与意义消逝——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异化与“减速”实践设计

作者: 喻国明, 贾贝熙

DOI: 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723.001

收稿日期: 2026-07-06

网络首发日期: 2026-07-23

引用格式: 喻国明, 贾贝熙. 词元霸权与意义消逝——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异化与“减速”实践设计[J/OL].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https://doi.org/10.14100/j.cnki.65-1039/g4.20260723.001>



网络首发: 在编辑部工作流程中, 稿件从录用到出版要经历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等阶段。录用定稿指内容已经确定, 且通过同行评议、主编终审同意刊用的稿件。排版定稿指录用定稿按照期刊特定版式(包括网络呈现版式)排版后的稿件, 可暂不确定出版年、卷、期和页码。整期汇编定稿指出版年、卷、期、页码均已确定的印刷或数字出版的整期汇编稿件。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稿件内容必须符合《出版管理条例》和《期刊出版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学术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和先进性, 符合编辑部对刊文的录用要求, 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及其他侵权行为; 稿件内容应基本符合国家有关书刊编辑、出版的技术标准, 正确使用和统一规范语言文字、符号、数字、外文字母、法定计量单位及地图标注等。为确保录用定稿网络首发的严肃性, 录用定稿一经发布, 不得修改论文题目、作者、机构名称和学术内容, 只可基于编辑规范进行少量文字的修改。

出版确认: 纸质期刊编辑部通过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签约, 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出版传播平台上创办与纸质期刊内容一致的网络版, 以单篇或整期出版形式, 在印刷出版之前刊发论文的录用定稿、排版定稿、整期汇编定稿。因为《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是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的网络连续型出版物(ISSN 2096-4188, CN 11-6037/Z), 所以签约期刊的网络版上网络首发论文视为正式出版。

词元霸权与意义消逝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传播异化与“减速”实践设计

喻国明^{1,2} 贾贝熙¹

摘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普及不仅未带来传播的乌托邦,而且在算力稀缺的约束下催生“词元”的资源化与权力化。文本基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媒介现象学视角,提出“词元政治”分析框架,揭示人机传播中“工程效率”对“生活形式”的殖民化过程。研究发现,当词元成为可计价的通用货币时,用户的自然语言被迫从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退化为香农信息论式的“执行指令”。在这一机制下,解释性、接触性与体裁性冗余被系统性剥夺,导致冗余在人机间发生结构性再分配——人类失去“试错与铺垫”的权利,机器垄断“推理与解释”的权力。这种“信息充足而意义匮乏”危机的实质是主体性从“思考者”向“结果消费者”的静默让渡。文本主张通过恢复解释性、接触性与时间性冗余,重估“无用之用”的传播价值,为智能时代捍卫人的主体性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词元政治;生成式人工智能;传播异化;冗余价值;认知外包;传播政治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49;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245(2027)00-0000-00

一、问题提出:从“语言游戏”到“词元兑换”

词元(Token)是大语言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①,但并非模型处理文本时使用的最小语义计算单位。在人机交互过程中,无论是用户向AI发出指令,还是系统内部进行检索、推理、工具调用与多轮反馈,都依赖词元的持续消耗。随着以开源智能体框架“龙虾”(OpenClaw)为代表的智能体的普及与应用,生成式人工智能从仅支持提

示驱动和单次内容输出转向具备持续状态、任务分解与协同执行等复杂行动能力的智能体系统^②,与此同时,智能体完成单次任务消耗的词元数量与日俱增。智能体在单次自主规划、多步推理或工具调用任务中消耗的词元数量是传统问答式的数百倍^③,截至2026年3月,我国日均词元调用量超过140万亿个^④。在词元需求呈指数级增长的同时,其运行依赖的算力、电力等基础资源并未以同样的速度同步扩张。这使受电力、算力以及AI自身性能约束的词元天然地具有稀缺性与可计价性。在这一

收稿日期:2026-07-06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构建政策实施和舆论引导相协同的预期管理机制研究”(25&ZD17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贾贝熙,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潘宏亮、杨文光、叶璐:《我国词元经济发展的条件、约束与推进路径》,《中国流通经济》,2026年第6期。

② 陈昌凤:《认知代理与知识秩序的重构:智能体时代的知识传播机制研究》,《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

③ 周文、杨正源:《词元经济与智能时代新质生产力培育与加快发展》,《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611.1306.002。

④ 《刘烈宏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并演讲(全文)》,https://www.nda.gov.cn/sjj/jgsz/jld/llh/llhldhd/0323/20260323202204680553721_pc.html。

结构性约束下,词元逐渐从技术层面的计算单位转化为具有明确成本属性的资源计量方式,并渗透至人机交互过程中用户的语言表达本身,使语言整体呈现前所未有的资源化特征,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被赋予隐含的成本结构,从而使语言逐渐转变为一种可计价的“传播资源”。在这一背景下,用户为以更低成本获得更高质量的输出,逐渐形成“节约词元”的交互意识,在人机交互过程中主动压缩表达,删除背景铺垫、避免模糊性和重复性表达,以更加精准、简洁、结构化的语言向AI提问。

可以将节约词元为主要目的的交互视为对香农信息论中工程逻辑的延续。在信息论中,信息被定义为能够消除不确定性的有效内容,噪声则是干扰信息准确传输的因素,冗余即超出最低传递需求的重复部分。虽然冗余在传播中有助于抵抗噪声、提高系统稳定性,但在效率导向的人机交互中,日常人际交往中的寒暄、停顿、铺垫、重复与解释越来越被视为无助于任务完成的“噪声”,因为其会增加词元消耗,降低交互效率。传统传播中维系关系与理解的冗余信息正在逐渐失去合法性。但语言并非传递信息的工具,而是主体通过具身性活动建构意义的仪式^①。工程学建立的信息论模型并未将意义的生成与传递包含其中^②。语言游戏理论认为,语言并非机械性的信息传递,而是在信息传递过程中融合了语言的运用方法和活动^③。在这一意义上,嵌于人们日常交往场景中的寒暄、重复、模糊表达、情感确认乃至沉默和停顿等冗余信息都非单纯的重复,而是意义生成的重要机制。其通过解释性铺垫、接触性确认和体裁性重复,为理解提供索引,为共识提供基础^④。但当词元成为语言的计价单位时,香农意义上的“效率”开始不断挤压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生活形式”,语言逐渐从意义协商的过程转变为任务执行的工具。进言之,词元推动语言规则本身重构。词元的稀缺性重塑了什么是“正确的话”,即模糊性、犹豫、寒暄与重复被系统性排斥,明确、结构化和结果导向的表达成为新的合法语言形式。新的语言规则不仅改变传播方式,而且重塑人的认知结构。语言作为人类认知的核

心^⑤,语言规则的改变会引发思维方式的改变,主体性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与此同时,与用户端不断被要求去冗余相伴的,是系统端词元消耗的持续扩张。一个编程智能体执行一个复杂任务,可以消耗数百万词元,且能够24小时不间断运行。一家企业部署上千个智能体,年词元消耗量可能超过一个中等国家全部人类用户消耗词元的总和^⑥。用户提出的一句极度精炼的人类指令,背后通常对应智能体大量检索、验证、推理、回溯和链式计算。冗余并未消失,而是发生了结构性的再分配:人类被要求不断压缩表达,机器则获得越来越多进行解释、试错、验证与延迟思考的机会。AI获得的并非更多的词元本身,而是掌握在对话中生产冗余的权力。因此,当解释、铺垫、试错与延迟等冗余劳动被转移至机器时,被转移的不仅仅是词元的消耗权,更是意义的生产权。本文将这种围绕词元生产、分配与消耗展开的权力关系称为“词元政治”,指不同主体围绕词元资源展开的配置与争夺过程。在智能传播环境中,用户、平台、模型开发者以及智能体系统共同参与词元资源的分配。谁能够获得更多词元用于解释、推理、验证和试错,谁就拥有更强的意义生产能力。因此,词元不仅是一种技术资源,而且是一种新的传播权力资源。

概言之,词元已经从技术参数异化为具有成本属性的“传播资源”,由此产生“生活形式/语言游戏”与“工程效率/去冗余”间的内在矛盾。关键在于,算力稀缺确立“词元政治”的新秩序,语言规则被重构,模糊性、寒暄与重复被视为“噪声”被剔除。

基于此,本文试图讨论:在词元稀缺的背景下,当人们在人机交互中使用的自然语言规则被不断改写,传播从意义协商逐渐转向任务执行,作为用户的人,其认知方式将被如何重塑?当精准化沟通不断压缩解释、铺垫、重复与延迟等冗余成分,AI系统内部却获得越来越多进行推理、验证与试错的机会时,冗余是否正在发生结构性转移,进而导致意义生产权的重新分配?当人越来越容易获得

① 余红兵:《语言活动的仪式性——一次语言符号学的冒险》,《社会科学战线》,2025年第3期。

② C.E.Shannon.A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The 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 1948(3): 379-423.

③ 郑炳楠:《基于维特根斯坦哲学的人—机语言游戏》,《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④ 白姗姗:《无用之用:冗余在传播中的符号学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⑤ 蔡曙山:《人工智能时代的语言与认知》,《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6年第4期。

⑥ 白惠天、袁晓辉:《Token经济学刍议》,《中国经济时报》,2026年4月17日,第2版。

结果,越来越难以经历理解本身时,是否正在面临一种“信息充足而意义匮乏”的新型意义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传播学是否需要重提冗余的价值,以重新捍卫人在智能时代中的主体性地位?

二、机制逻辑：生成性约束下的意义离场

(一)资源的重构：从“信息稀缺”到“词元稀缺”

资源稀缺性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指可供支配的资源无法充分满足人们无限增长需求的状态^①。传播活动同样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展开。事实上,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稀缺资源争夺的历史(信息>渠道>注意力>词元)。词元稀缺是一种“生成性约束”,不仅限制传播结果,而且规训“如何表达”。

在大众媒介出现前,信息垄断和信息控制是社会的主要特征^②,信息本身构成传播活动最重要的稀缺资源之一,掌握信息意味着掌握传播优势与社会权力。随着印刷术、电报、广播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信息本身逐渐由稀缺转向丰富。然而,信息的流通仍受媒介渠道限制^③。有限的报纸版面、广播频率和电视时段构成新的稀缺资源,传播权力因此集中于少数掌握媒介渠道的机构手中,传播竞争的核心表现为对传播渠道和发布资格的争夺。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削弱渠道壁垒。任何个体都能够以极低成本进行信息生产与传播,传统意义上的渠道稀缺逐渐被打破。当信息供给呈指数级增长时,受众的认知能力和时间资源并未同步扩张。传播活动由此进入以注意力稀缺为核心特征的新阶段,注意力成为数字平台时代最重要的传播资源之一^④。可以说,随着媒介技术发展不断推进的传播史本质上是一部对稀缺资源的争夺史。媒介技术的发展并未消除稀缺性,而是在不断重塑稀缺性的具体形态,传播权力的分配逻辑随着

稀缺资源形态的变化不断调整。

生成式人工智能出现后,传播活动中的资源稀缺性表现为词元稀缺的新形态。作为大语言模型处理和生成信息的基本计算单元,词元不仅决定生成内容的数量、质量与速度,而且决定模型能够进行何种程度的理解与推理。据估算,生成一段一分钟的AI视频大约消耗百万词元,生成一部完整的AI漫剧需要消耗上亿词元^⑤。可以说,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生成能力本质上取决于对词元的组织、调度与消耗能力。然而,词元并非无限供给,其生成受制于数据、算法、算力基础要素的供应^⑥。高质量数据决定模型能够学习和调用的知识边界,算法决定模型组织和关联词元的能力,算力决定词元处理与生成的规模和效率。由于底层资源均受技术、资本和制度条件的约束,词元的生产与使用始终存在成本和边界,成为一种可计价、可分配的生产资料^⑦。不同于传统媒介时代资源约束主要体现为“能否传播”“传播给谁”等结果性限制,词元机制表现为“如何表达”“表达多少”的生成性约束。词元作为人机交互过程中新的通用货币,使每次推理、每段文本以及每个补充解释都被纳入实时计量和成本计算体系之中,传播活动的运行逻辑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二)成本的内化：从“自然表达”到“语言审查”

词元的可计价机制对人机交互过程中的人类自然语言表达产生影响。词元的稀缺性促使大部分大语言模型产品采取输入词元与输出词元分开计费的方式向用户收取费用,主流大语言模型对每百万输入词元收取的费用为0.2-5美元,输出词元的费用是输入价格的2-5倍^⑧。当用户意识到每个词元对应实际的经济成本或配额消耗时,人机交互过程中语言的使用逻辑开始从“表达”转向“兑换”。在这一情景下,人们并非在传统语言游戏中基于语境充分展开表达,而是不断进行一种隐性的成本一收

① 朱富强:《论资源的使然性而非实然性——重审现代经济学的资源稀缺性假设》,《社会科学研究》,2023年第3期。

② 王成文:《信息权力结构的演变与大数据时代的“编辑智能论”》,《出版发行研究》,2013年第6期。

③ 陈鹏:《内容与渠道创新基础上的吸引力经济:传媒经济本质的另一种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4期。

④ 修利超、喻国明、杨雅:《认知竞争的发生机理:三个关键性的分析视角》,《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5期。

⑤⑥ 夏璋煦、徐政:《“十五五”时期智能经济新形态下“词元经济”的内涵特征、生成逻辑与推进路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https://link.cnki.net/urlid/50.1023.C.20260518.1128.006。

⑦ 蒙慧、肖丙浩:《“十五五”时期词元经济的生成基础、价值机制与治理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统一战线学研究》,https://link.cnki.net/urlid/50.1215.C.20260520.1717.005。

⑧ 《Token,正在重新计量世界》,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2970845。

益计算：每增加一个词元，就意味着额外的经济支出或预算消耗。

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个体会根据不同情境对资源进行心理划分与编码，并在特定账户框架下进行决策^①。在传统人际传播中，人们通常不会将语言表达视为需要精确核算的资源，因此，寒暄、铺垫、重复、试探和情感确认等内容能够自然地进入交流过程。在词元稀缺与显性计费机制共同作用下，语言开始获得明确的成本属性，表达活动也被纳入成本计算框架之中。用户逐渐将“词元消耗”编码为独立的心理账户，并将每次提问、补充和解释视为对该账户余额的消耗。当表达成本纳入心理账户后，用户不仅会关注 AI 输出结果的质量，而且会持续监控自身语言投入的成本。这种成本意识进一步促使个体在人机交互过程中进行预先筛选和自我约束：与任务目标关联度较低的背景信息、情感表达、模糊描述以及重复性解释，通常被主动删除或压缩。换言之，语言表达不再完全遵循“充分表达以确保理解”的交往逻辑，而是逐渐服从于“控制成本以提高效率”的资源配置逻辑。用户由此成为自身语言行为的审查者，在不断权衡表达收益与词元成本的过程中形成持续性的自我审查机制，并最终推动自然语言向更加简洁、结构化和结果导向的语言压缩。为节约词元，用户将主动进行自我“语言审查”，删除背景、情感与试探，语言成为纯粹的兑换指令。

（三）语言降维：从“嵌于生活”到“指令执行”

词元稀缺引发的语言压缩不仅仅表现为用户提示信息字数的减少或信息密度的下降，更会引发人机交互过程中自然语言的降维。语言游戏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在于使用，语言与人的生活活动不能完全分离^②，语言的意义只有在特定情境中方可展现^③。即语言的意义并非通过其内容被“表达”，而是在互动、语境与实践中被“生产”出来。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通过参与具体生活形式理

解语言，而是依照经验主义产生的概率关联：其仅处理词元之间的最优链接（相关性）和贝叶斯微调（演化性）^④，既不理解语义，也不参与任何社会实践或生活形式，将语言从需要共享规则、实例示范和主体间互动的游戏，降维为纯粹的关系计算系统，从而打破语言游戏赖以成立的规则的社會性、意义的实践性以及理解的规范性基础。

在用户端，这一降维表现为用户使用的自然语言由此逐渐脱离其原有的生活情境。用户在人机沟通中不断主动压缩表达，删除背景信息、减少情绪性内容、避免重复性语言，以更加精准、结构化的方式进行提问。表达不再首先服务于理解，而是率先服务于效率。语言的形态由此发生质的转变：从镶嵌于生活形式的游戏蜕变为面向系统执行的指令，因而不具备情景赋予的语言意义。在传统人际传播中，模糊、犹豫、寒暄和重复等冗余信息原本是意义生成的重要条件，但在词元逻辑下，其被重新定义为“噪声”或“无效成本”，表达开始呈现明显的压缩化、结构化与标准化特征，词元不仅限制人说多少，而且规定人应该怎样说，并为意义危机与认知重塑奠定机制基础。显然，AI 并不理解人类的生活形式，仅计算概率关联。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语言被迫降维，脱离具体情境，变成标准化的指令输入。语言一旦失去情景赋予的意义，便仅剩执行功能。

三、危机的三重奏——前理解、关系与共识的崩塌

信息论认为“如果信息系统中的一个信号所载有的信息可以从该系统其他信号中再次获得，那么这个信号所载的信息即为冗余信息”^⑤。对于冗余作用的研究不一而足，有学者认为冗余信息会造成信息过载，导致人产生焦虑情绪^⑥。也有学者认为，冗余可以消除信息噪声的干扰，促进记忆，帮助信

① R.Thaler.Mental accounting and consumer choice,Marketing Science, 1985(3): 199-214.

② 盖晓兰：《后期维特根斯坦意义观在翻译中的运用》，《外语学刊》，2009年第6期。

③ 王明、谭广鑫：《从实操性证成到语言游戏：体育知识生成的语言哲学审视》，《体育学研究》，<https://doi.org/10.15877/j.cnki.nsic.20260417.001>。

④ 赵汀阳：《元语言、思想语法及大语言模型语法的哲学评论》，《语言战略研究》，2026年第1期。

⑤ 戚桂杰、李娜、王凯平等：《开放式创新平台用户交互、信息冗余与知识贡献研究》，《现代情报》，2020年第12期。

⑥ 刘鲁川、张冰倩、李旭：《社交媒体信息过载、功能过载与用户焦虑情绪的关系：一项实验研究》，《信息资源管理学报》，2019年第2期。

息接收者快速抓住重点,产生积极的效果^①。但这些结论均未跳出信息论视角,仅关注信息的传递,未涉及信息能否产生意义。事实上,冗余对于意义生成具有重要作用,其价值在于为理解提供结构性条件:通过解释性重复与语境铺垫帮助接受者形成稳定理解,通过寒暄、确认与停顿维系传播关系,并通过体裁形式的重复为公共理解与社会共识奠定基础^②。因此,当词元的稀缺成为人机间沟通不断压缩冗余、将传播简化为最小信息传递路径时,被削弱的不仅仅是表达的“多余部分”,更是意义生成本身。一言以蔽之,冗余的剥夺即意义的剥夺,词元政治本质上是一场静默的系统性崩塌。

基于此,本文从微观的个体认知、中观的人际互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三个层面,分析冗余缺失引发的意义危机。

(一) 微观层面:解释性冗余消失加剧前理解崩塌

德国哲学家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认为,任何理解都建立在“前理解”之上,人总是带着既有经验、文化背景和解释框架进入理解过程^③。特别是在双方使用不同语言交流时,各自母语的结构差异会渗透至思维过程,形成不易察觉却持续存在的语言摩擦,导致双方在抽象思维、推理和共同解决问题时产生不一致或阻力^④。语言摩擦并非单纯的误解或信息噪声,在实际理解过程中,摩擦通常来自不同主体在概念组织、语义关联与推理路径上的差异。因此,“同一句话”在不同主体间无法自动对齐,而是基于交流双方在理解过程中不断协商与再阐释的需求。在这一意义上,前理解不应被视为稳定的背景条件,而是一种需要在互动中不断被调适与协商的解释性结构。解释性冗余即在交流过程中帮助调适协商前理解的重要机制,通过背景铺垫、元语言说明、重复提示和逻辑展开,为接受者

提供理解的索引,使文本能够在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解释结构^⑤。例如,背景性的说明帮助人们判断问题发生的条件,重复性的提示帮助人们确认核心含义,推理过程的展开使人们理解答案为何成立。

在人机交互过程中,自然语言与机器语言之间天然存在强烈的语言摩擦。自然语言理解建立在情境依赖之上,其意义通常具有开放性与模糊性,依赖交互中的默会补全^⑥;机器语言及其处理机制以结构化、显性化与规则化表达为前提,要求输入必须尽可能消除歧义并转化为可计算形式^⑦。二者间的张力使原本在自然交流中可以被语境自动调节的意义差异被迫在语言层面显性化,从而显著放大不同表达系统之间的对齐难度,并强化语言摩擦的强度。为缓解这一语言摩擦,用户本应提供更多的背景信息、铺垫信息或通过多次试错等帮助AI明晰自身需求。然而,在词元稀缺的条件下,这些“不直接产出结果”的内容通常最先被压缩。用户越来越倾向于删除背景信息、跳过推理过程、减少重复确认和举例说明,人类就此失去提供背景、进行试错的权利,导致“理解”被简化为“检索”,传播被压缩为从“提问”到“答案”的直接通道。虽然信息能够快速抵达,但意义无法稳定生成,人们获得结果,而不是理解本身,人们得到答案,却失去通往答案的地图。换言之,没有背景铺垫和推理试错(解释性冗余),人机交互就变成了“检索”而非“理解”。

(二) 中观层面:接触性冗余消失触发关系危机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卡斯珀·马林诺夫斯基提出“寒暄式交流”概念,认为这类言语的目的不在于传递具体信息,而是“通过纯粹的语言交换来建立联结纽带”,其本质是一种用于创造、维持与强化社会关系的交往形式,而非以信息交

① 陈旭霞、高雅馨、吴溪:《冗余信息还是有用信息?——基于IPO招股说明书风险信息披露的一项实验研究》,《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22年第10期。

② 白姗姗:《无用之用:冗余在传播中的符号学意义》,《文艺理论研究》,2025年第1期。

③ 李雪、张杨:《伽达默尔对话理论的本土转化与中国文学批评的范式创新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0期。

④ A.M.Joshi,N.Lahiri.Language friction and partner selection in cross-border R&D alliance formation,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15(2):123-152.

⑤ 龙又珍:《语言冗余信息的性质、特点、分类及应用》,《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12期。

⑥ 吴炳章、张思永:《如何在语境中澄清模糊概念?》,《现代外语》,2004年第3期。

⑦ 隋然:《自然语言与逻辑语言:人脑与电脑》,《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S3期。

换为中心的工具性沟通^①。在这一意义上，寒暄不“增加知识”，而是通过语言本身的流动性使交往双方进入同一社会情境之中，从而为后续意义交换奠定关系基础。美籍华裔语言学家罗曼·雅各布森将“寒暄式交流”系统化为语言的“寒暄功能”，强调其核心任务在于建立、维持或确认传播信道是否畅通。诸如“你在听吗”“嗯嗯”“在吗”等表达并不承载实质性的信息内容，而是不断对传播通道进行校验与激活，使交流得以持续发生^②。由此可见，寒暄与确认性表达并非冗余意义上的“多余信息”，而是维系传播成立条件的接触性冗余，通过持续的互动确认，使个体得以进入共享的交往空间，并维持社会性联结的稳定存在。

在人机交互场景中，这类寒暄语与确认性表达通常被视为低信息密度的“无效词元”，在效率优化与词元压缩逻辑下被系统性剔除或弱化。当“你在吗”“谢谢”等用以建立关系的语言被当作非必要内容加以压缩时，传播过程随之发生结构性转变：原本依赖接触性冗余维系的社会性交往结构被压缩为以结果输出为导向的功能性操作流程。人机传播由此失去建立信任和情感链接的缓冲带，传播沦为冷冰冰的数据交换。传播不再首先被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生成过程^③，而是被简化为信息输入与答案输出之间的映射关系。在寒暄承担的信道确认、情感调适与关系润滑功能被削弱后，人机交互中的信任建立机制随之弱化^④，传播逐渐从“关系性的共同在场”退化为“去社会化的信息处理”。在这一过程中，传播不仅失去维系社会联结的基础维度，而且使原本嵌入语言的情感性与关系性冗余被系统性排除，进而导致意义生成过程的社会基础被不断抽空。

（三）宏观层面：体裁冗余消失后引发共识危机

任何文本都需要通过对既有文化形式的重复进入特定体裁，论文之所以像论文，演讲之所以像演

讲，依赖文本外部的冗余结构，即体裁冗余^⑤。其为接受者提供理解文本的预期框架和解释线索，使传播能够在较低认知成本下顺利完成。从宏观视角看，体裁冗余不仅是一种文本组织机制，而且是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协调机制，通过不断重复和强化特定的表达形式，体裁得以帮助个体在复杂的社会情境中定位自己的认知与行为^⑥。例如，当人们阅读学术论文时，会预期其建立在证据和逻辑论证基础之上；当人们观看新闻报道时，会期待其遵循事实陈述与公共议题讨论的规范。正是这些被长期重复和固化的体裁规则，使社会成员能够在面对复杂信息时形成相对一致的理解基础，从而为公共讨论与社会共识的形成创造条件。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广泛介入传播活动后，体裁冗余面临被持续压缩的风险。在词元稀缺与效率优先的逻辑下，越来越多的传播行为被简化为“指令—输出”结构，而非完整保留某一体裁要求的结构性铺垫与文化规范。在这一过程中，原本承载社会规则与文化秩序的体裁形式被不断弱化。这种变化意味着公共领域正在从基于共同理解的共识转向基于共同结果的共识。前者强调不同主体通过共享的体裁规则和解释框架不断协商意义，即通过理性商谈达成理性共识^⑦；后者更多依赖技术系统输出的一致答案维持表面的认知统一。当体裁冗余被持续压缩，社会失去通过理性商谈达成一致的机制，只剩算法给定的统一答案。公共讨论依赖的解释过程、论证过程和意义协商过程被逐渐削弱，人们对于同一问题的认知基础变得愈发脆弱。因此，体裁感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传播形式的简化，而且可能导致公共理解机制的退化，并最终演化成为一种新的公共危机：人们拥有相同的答案，却失去了理解这些答案的能力。此即为答案的“暴政”：体裁（例如，论文、新闻的固定格式）是社会共识的容器。当体裁冗余被压缩，公共讨论失去协商机制，仅剩算法

① B.Malinowski, C.K.Ogden, I.A.Richards.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Language and Literacy in Social Practice: A Reader, 1923 : 1-10.

② H.Putnam. The meaning of “meaning”, 1975.

③ 刘建明：《“传播的仪式观”的理论突破、局限和启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④ 齐永光、刘英玲：《媒介等同视域下AI情感安慰的有效性 with 用户信任研究》，《学术交流》，2026年第3期。

⑤ 赵毅衡：《艺术与冗余》，《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

⑥ C.Bazerman. Speech acts, genres, and activity systems: How texts organize activity and people, What Writing Does and How It Does It, Routledge, 2003 : 315-346.

⑦ 王晓升：《强意识形态、弱意识形态与理性共识——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看意识形态斗争策略》，《学术研究》，2011年第4期。

给定的统一答案，导致“信息充足而意义匮乏”。

四、主体的让渡：从思考者到结果的消费者

在算法黑箱中，认知外包造就主体性悄然退场。语言作为人类重要的认知能力，当表达被持续压缩、冗余被系统性剔除，语言规则改变重塑的不仅仅是人说话的方式，更是人思考的方式。词元稀缺背景下去冗余化的交互逻辑重塑主体的认知习惯与自我意识，人类逐渐成为为算法提供数据投喂的算力燃料。随着冗余的让渡，人类认知的重塑体现在三个方面：思维从过程性的展开转向结果性的消费，元认知能力在认知委托的不断深化中趋于萎缩，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承载的协商空间在精准化表达的规训下日渐收窄。人在这一过程中完成了一场静默的角色迁移，从主动的思考者退场为被动的结果消费者。

（一）思维压缩化：从过程性思考到结果性消费的新数字泰勒主义

在去冗余化的沟通逻辑下，生成式人工智能使“新知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生产、组织和输出。加速化的知识供给改变了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重塑人们对思维过程的理解。面对海量且即时可得的信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浅阅读”和碎片化阅读快速获得答案^①。但这种“加速”并不契合人类获取知识的习惯，会使个体难以获得足够时间进行反思、理解、意义建构与内化^②，人们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对知识的识别和理解^③。词元的限制使复杂推理、开放性思辨以及充满不确定性的认知探索逐渐被视为低效率活动，思维开始从过程性生成转向结果性消费，人们不再耐心地“想明白”，而是习惯于快速地“得到答案”。

这种思维压缩意味着思考过程发生转移。在用户端，人们为节约词元和提高交互效率，不断压缩问题背景、删减推理过程、减少试错与反复讨论，

希望以最短的输入获得最直接的输出；在机器端，大语言模型在后台消耗大量词元进行搜索、预测、推理与规划。一个看似简洁的答案背后，通常隐藏着远超用户输入规模的计算过程。这一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当前智能传播时代的“算法劳动”机制。在工业社会，泰勒主义通过对劳动过程进行分解、标准化和流程化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但使工人逐渐失去对完整劳动过程的掌控^④。在智能时代，平台资本依托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将劳动边界再次外推至用户社会行为的数据生产^⑤。在人机交互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将用户的提问与需求拆解为可记录、可计算与可预测的数据单元，并迅速作出回答。在这一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将原本属于人的思维活动重新拆解为可计算、可预测的词元序列，由算法代替用户完成。对于用户而言，思考过程逐渐从人脑黑箱变为算法黑箱。这会形成一种新的数字泰勒主义：人类不再直接参与复杂思维的展开，而是将思维拆解、外包并委托给后台运行的词元流水线完成。最终，人类的思维开始按照机器的运行逻辑被重新塑造，认知结构由此呈现明显的压缩化与工具化倾向。

（二）元认知萎缩：从辅助思考到替代思考

当机器不仅帮助人获取信息，而且开始承担解释、判断与推理任务时，技术从工具转向认知代理。人类将本应由自身完成的理解过程交给机器，形成一种深层的认知委托。对于这种长期认知委托引发的后果，心理学研究中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体的低阶认知功能（例如，感知、注意、记忆和简单理解）可能因被“外包”或“卸载”给人工智能工具而呈现一定程度的削弱，但会将节省出的认知资源调配给高阶认知功能，从而推动整体认知表现的显著提升。这种通过外部辅助减轻个体的内在认知负担，可释放更多的心理资源以支持高阶认知活动的过程被称为认知卸载^⑥。第二种观点认为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诱导的认知萎缩（AI Chatbot Induced Cognitive Atrophy，

① 周蔚华、程丽：《人工智能知识传播下的新阅读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编辑之友》，2025年第3期。

② D.Susser.Decision time:Normative dimensions of algorithmic speed,Proceedings of the 2022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Accountability,and Transparency,New York:Printed b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2 : 1410-1420.

③ J.Zheng,M.Meister.The unbearable slowness of being:Why do we live at 10 bits/s? Neuron, 2025(2):192-204.

④ 黄种兴、高进：《数字泰勒主义的范式生成、权力拓扑与秩序重构》，《学习与实践》，2026年第5期。

⑤ 孙萍、廖文钰、陈欣欣：《关于平台、劳动与媒介研究的历史回溯与理论思考》，《全球传媒学刊》，2023年第5期。

⑥ E.F.Risko,S.J.Gilbert.Cognitive offloading,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2016(9):676-688.

AICICA)^①,即生成式人工智能会在无意中削弱用户的主动思考能力与推理、分析、综合、评价、创造等高阶认知技能,主体逐渐失去独立判断的能力,思考不再发生于主体内部,而是越来越依赖系统的外部运算。认知外包最终演变为主体性外包。二者的区别在于主体对认知过程的控制程度不同:认知卸载是一种功能性外包,即将部分低阶认知任务转移至外部工具,从而释放资源以支持更高阶的认知活动,主体仍保持对整体思维过程的控制;认知萎缩表现为结构性替代,外部系统不仅执行认知任务,而且会逐渐取代主体的思维生成过程,使认知从“内部生成”转向“外部依赖”,进而导致独立思考能力的弱化。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日常认知活动的背景下,用户的认知卸载行为正在经历从记忆外包向思考外包的质变^②。值得关注的或许并非用户因认知委托导致的记忆、理解等执行功能是否下降,而是其元认知能力是否受到影响。元认知强调个体对自身思考过程的觉察、监控与反思能力,即“对思考的思考”^③。有研究发现,元认知能力在人因过度依赖AI产生认知惰性时可以发挥刹车作用^④。随着人机交互过程中冗余内容的丧失,用户不仅将计算和检索任务交给机器,而且逐渐将“为什么如此”的解释权交给机器。因此,人们获得的只是结论,而略去算法加工后的意义框架与理解路径。随着解释活动越来越多地在模型内部完成,人类亲自参与推理、质疑、修正和反思的机会不断减少,人对自身思维过程的监控能力必然会逐渐弱化。因此,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未必表现为知识储备的减少或智力水平的下降,更可能表现为元认知能力的萎缩。个体依然能够获得正确答案,甚至较以往更高效地完成任务,但越来越难以说明自己为何相信这一答案、如何形成这一判断以及这一结论可能存

在何种局限。

(三)绝对精确的“暴政”:模糊性消退与“协商空间”的坍塌

1972年,美国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提出模糊限制语(Hedges)概念,用以指称使表达呈现不确定性或边界弹性的语言形式^⑤,例如,“可能”“大概”“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虽然这类表达削弱了命题的确定性,但能够调整话语的真值强度,使说话者在不同情境中更加灵活地表达认知状态与态度立场。在人际传播中,模糊性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一方面,其为未完成的思考保留空间,使个体能够在不确定状态中逐步形成判断;另一方面,为人际关系提供缓冲机制,通过降低表达的绝对性与直接性,减少潜在冲突与面子威胁,从而维系交往的连续性与稳定性^⑥。因此,模糊性不仅服务于信息表达,而且深度嵌入社会关系的维护与协商过程。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与高效率导向的人机交互语境中,这类模糊表达逐渐被视为“低效信息”。用户不断被引导以更加直接、精确的方式进行表达。结果是犹豫、铺垫、试探性语言与模糊限制语被持续压缩。这种变化不仅改变言语形式,而且影响主体的认知与交往方式。当人们长期在高精确度、低容错性的交互环境中进行表达时,会逐渐降低对不确定性与模糊状态的耐受能力,倾向于追求即时、明确的答案,而非在开放语境中进行协商与推敲^⑦。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逻辑可能从人机交互反向渗透至人际交往,使人们在面对他人时倾向于使用工具化、结论导向的沟通方式。由此,传播中的情感维度与协商空间被不断压缩^⑧,模糊性承载的关系调节与意义生成功能逐渐弱化。虽然人们获得了更加高效的信息交换,但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与不确定性共处、与他者共同建构意义的能力。因

① I.Dergaa,H.Ben Saad,J.M.Glenn,et al.From tools to threats:a reflection on the impact of artificial-intelligence chatbots on cognitive health,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24(15):1259845.

② 王斌、刘冠男:《数字认知卸载的动力机制、认知挑战与应对策略》,《青年记者》,2026年第4期。

③ J.H.Flavel.Metacognition and cognitive monitoring:A new area of cognitive-developmental inquiry, *American Psychologist*, 1979(10):906.

④ 庄严、钱鹏:《用而不思?——GAI辅助学术阅读新型认知惰性形成影响机制》,《图书馆论坛》,https://link.cnki.net/urlid/44.1306.G2.20260527.1403.002。

⑤ 刘美好:《基于CiteSpace的近十年内模糊限制语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今古文创》,2025年第44期。

⑥ 张浩:《模糊限制语在英语电视访谈类栏目中的应用分析》,《当代电视》,2015年第12期。

⑦ 应国丽、周红:《模糊限制语语用功能与礼貌原则相关性研究》,《中国外语》,2009年第2期。

⑧ 李梦云:《数字化交往中精神文化生活的异化风险及其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6年第3期。

此，传播从开放的社会互动过程逐渐转向追求确定结果的技术性操作，其内在的情感弹性与关系厚度随之被削弱。

五、重估“冗余”的价值：确立“无用之用”，为智能传播安装“减速带”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嵌入社会肌理的当下，人们正陷入一种前所未有的传播悖论：信息的生产速度达到纳秒级，但人类的理解速度在急剧滞后。算法以“效率”之名，将自然语言中的寒暄、停顿、模糊与重复定义为需要剔除的“噪声”与“冗余”。如前文所述，这种对“冗余”的系统性清洗，实则是对人类意义生产权的剥夺。为逆转这一趋势，必须重估“冗余”的价值，将其从传播的负资产重新定义为智能时代的稀缺资源。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呼吁，更需要通过具体的“慢传播设计原则”（Slow Tech Design）为高速狂奔的技术安装物理与心理的“减速带”。

在词元稀缺与效率优先逻辑下，冗余常被视为传播中的“无效成本”，似乎只要不断压缩重复、铺垫与停顿，沟通就能够变得更加高效。但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意义、关系与主体性的生成过程。冗余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浪费，而应被重新理解为传播得以成立的基础设施。其不仅帮助信息跨越噪音，而且维持意义的稳定性、社会连接的持续性以及主体在传播中的存在感。尤其是在人机交互中，当词元成为可计量资源时，重新理解冗余实际上是重新确认人作为意义主体的位置。具体而言，可以从恢复解释性冗余、接触性冗余以及时间性冗余三方面重寻无用之用的冗余，为智能时代的人机传播安装“减速带”。

（一）强制解释权：让算法为“黑箱”买单

在词元政治的规训下，用户习惯于索取“结论”，放弃追问“过程”。这种“结果导向”的交互模式使算法黑箱愈发幽暗，人类的元认知能力在长期的“认知外包”中逐渐萎缩。要打破这一循环，必须将解释性冗余重新强制性纳入人机交互的协议之中。解释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不应被视为对效率的干扰，而应被视为一种“强制性的透明度”。

这一转向的关键需要从机器与人两方面同时进行：在机器端，需要重新为解释过程赋予结构性保

障。例如，可通过“解释权法案”规定 AI 在输出结论时必须附带解释性词元，强制呈现推理路径与依据。算法解释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要求双向应答而非单向告知，且解释需具备可理解性（例如，对比性、选择性）与场景化特征^①，解释性词元的比例与内容不应固定，而应依据风险等级、用户知识水平等因素动态调整，从而将“可回答性”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协议，避免可理解性被效率逻辑吞没。在用户端，用户需要改变提问习惯，从被动接受答案转向主动参与解释过程的建构。这意味着不仅要关注“是什么”，而且要持续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还有哪些可能性”“这一结论成立的条件是什么”。通过对推理链条的持续追问，用户实际上是在重新激活解释性冗余，使理解从结果消费重回过程生成。

从深层意义看，恢复解释性冗余并非对效率的否定，而是对理解机制的再平衡。在高度自动化的认知环境中，如果解释过程被完全压缩，主体将逐渐失去对知识生成逻辑的把握能力。因此，将解释性冗余重新纳入人机交互，不仅在于提升透明度，而且是将认知过程重新交还主体本身，使理解重新成为可参与、可追溯、可反思的活动，使用户从追问“是什么”转向追问“为什么”，以此重建人类理解的地图。

人机传播领域的“解释权法案”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风险分级的解释机制：并非所有交互都需要长篇大论的解释。设计系统应根据交互的风险等级动态调整解释性词元的比例。例如，在医疗诊断、法律咨询或金融决策等高风险场景下，AI 的输出必须强制包含一定比例的解释性词元，展示其推理路径、数据来源及置信度区间。二是从“单向告知”到“双向应答”：当前的 AI 输出多为单向的文本流。慢传播设计应引入“反向确认”机制。即 AI 在给出结论前，必须先复述用户的语境假设，并询问：“我是基于以下理解来回答的，对吗”这种设计强制机器将隐性的概率计算转化为显性的意义协商。三是可视化推理链：在后台，模型消耗数百万词元进行推理；在前台，用户仅看到一个结果。慢传播设计应将这一庞大的后台“推理链”以可视化的形式（例如，思维导图或溯源图谱）部分呈现给用户。这不仅是为了解释，更是为了让用户“看见”被隐藏的劳动与逻辑，从而将理解重新交

^① 邹举、杨楠：《从“可控”“可知”到“可回答”：算法解释权的提出和实现》，《新闻大学》，2025年第4期。

还给人类。

（二）重建“人的温度”：在人机交互中重铸“接触性”纽带

语言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工具，更是建立联结的仪式。当“在吗”“谢谢”“嗯嗯”等接触性冗余被算法判定为低信息密度剔除时，人机传播就失去了情感的缓冲带，退化为冷冰冰的数据交换。这种“去社会化”的传播正在导致人类社会性的隐性流失。因此，必须确立这样的信条：沟通过程本身即具有价值，接触性冗余是维持主体间性与情感厚度的基础设施。

为恢复人机交互中的“人的温度”，需要设计一种“非效率化”的对话模式，专门用于修复和维系关系。一是拟人化的“呼吸感”设计：当前的AI回复通常追求毫秒级响应，这种绝对的即时性会带来压迫感。慢传播设计应引入“接触性停顿”。例如，在多轮对话中，AI应模拟人类的反应时间，在接收指令后有一个短暂的“思考”或“倾听”状态（例如，光标闪烁、语气词回应），这种微小的延迟能够有效缓解用户焦虑，并重建对话的“在场感”。二是情感确认的闭环：系统应鼓励甚至引导用户进行情感表达。例如，当用户表达困惑或不满时，AI不应直接跳转到解决问题的逻辑，而应先进行情感确认（例如，“听起来这确实让人很沮丧”）。这种设计保留了“寒暄功能”，使机器不仅是功能工具，更是具备一定程度的情感陪伴属性。三是容错与模糊的接纳：摒弃“精准指令”的单一标准，设计应允许用户进行模糊的、试探性的表达。系统应通过追问和确认帮助用户厘清思路，而不是因为用户的表达力不足而报错或给出错误答案。这种对模糊性的包容，正是人际传播中信任建立的基础。

（三）对抗即时满足：引入“必要的摩擦”与“时间性”冗余

意义的生成从来不是即时完成的，而是需要回忆、反复、停顿与沉淀。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多轮对话为核心的知识生产过程在互动形式上与人际交流中的话轮转换具有可比性。话轮转换指在日常会话中双方交替发言，每位说话者未被打断的连续语流即为一个话轮，在每次对话中听话者和说话者身份的交替即为话轮转换^①。在人际传播中，虽然人们通常希望话轮转换的时间间隔越短越好^②，但在教育、咨询等深度交流场景下，话轮间适当的停顿更有利于提升个体的理解与深度认知^③。

AI时代的人机传播越来越强调即时反馈与高效率输出，人们习惯于在最短时间内获得结果，却越来越失去停留、反思与等待的能力。真正的认知成长通常发生在延迟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追求的知识生产的“快”并不契合人类获取知识的习惯，既有研究同样发现高速的信息生产使个体难以获得足够时间进行反思、情境化与理解，并不利于个体对信息进行意义建构与内化^④；还有学者发现，相较于快速生成，较慢的信息生产有助于促进阅读理解和信息吸收^⑤。生成式人工智能需要将回复节奏与人类行为的自然节奏与认知能力相匹配，引入“必要的摩擦”（Desirable Friction）与“有意义的缓慢”^⑥，或通过交互设计引导用户进行多轮追问，对抗“即时满足”带来的思维浅薄化。

一是节奏匹配与话轮转换：人类的认知节奏与机器的运算节奏不匹配。慢传播设计应遵循人类自然的认知规律，例如，在教育、咨询等深度交互场景中，系统应避免一次性输出海量信息。相反，其应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多轮追问，通过分步引导，使用户在每个话轮间隙都有时间进行内化和反

① 宋庆一、蒋晓鸣：《话轮转换中的时间预期》，《心理科学进展》，2025年第12期。

② S.C.Levinson, F.Torreira. Timing in turn-taking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processing models of languag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2015, vol.6: 731.

③ Y.J.Lee, J.Donkers, H.Jarodzka, et al. Different effects of pausing on cognitive load in a medical simulation game,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20, vol.110: 106385.

④ D.Susser. Decision tim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algorithmic speed,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Printed b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2: 1410-1420.

⑤ Y.H.Chien, C.H.Chen, W.L.Wei. Effects of dynamic display, presentation method, speed, and task type on reading comprehension of wristwatch screens, *Displays*, 2008, vol.29(5): 471-477.

⑥ D.Susser. Decision time: Normative dimensions of algorithmic speed, *Proceedings of the 2022 ACM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New York: printed by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2022: 1410-1420.

思。二是延迟满足机制：对于某些复杂的创造性任务，系统可以设计“延迟交付”模式。即 AI 在接收任务后，不立即生成结果，而是告知用户：“我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请您也先想一想。”这种强制性的“冷却期”能够有效打断即时满足的回路，迫使人类重新拿回思考的主动权。三是“无用”信息的保留：在信息摘要或内容生成中，保留一定比例的“非核心信息”或“背景铺垫”。这些看似“无用”的冗余恰是连接知识点的桥梁，是帮助人

类建立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的土壤。慢传播设计应拒绝极致的“信息压缩”，允许信息在一定的时度上舒展，使意义在缓慢的流淌中自然浮现。

重估“冗余”的价值本质上是一场关于“人何以为人”的捍卫战。通过上述慢传播设计原则，试图在效率至上的词元政治中重新开辟属于人类意义生产的自留地。这不仅是技术的改良，更是对人类主体性的一次深刻“救赎”。